

在2013年剛開始熱議“大數據”這個觀念的人們，會發現自己不知不覺已落伍過時。2014年的人們顧不上再空談其概念和意義，他們蜂擁到大數據的各個富礦當中，埋頭於各種開發應用。據業內人士預測，大數據技術很快會出現在社會各個領域。

從數據本身來講，大數據的3個V(volume, velocity and variety)都是呈指數級發展的，翹首向上的曲線圖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大數據的下一個數量級(無論叫什麼)也將很快到來。一篇名為《2020年的數字宇宙》的研究報告計算出，從2005年到2020年，“數字宇宙”的規模將增加300倍之多，從130EB增加到40ZB，也就是40萬億GB，約為地球上所有海灘上的沙粒數量的57倍。

從古至今，海邊沙子、天上星星，一直都是“不可勝數”的同義詞，而在大數據時代的今天，它們竟成了不在話下的“小數據”。

伴隨數據爆炸式發展，數據處理技術也飛快發展，目前還屬於新奇玩意的數據批處理和存儲技術，轉眼就成了通用的計算基礎設施，成了企業數據架構的核心組件。這意味着，目前還掌握在數據科學家手中的專業，將很快成爲一般技能，幾年之內，人們運用MapReduce和Hadoop等大數據工具，也許就像當年接受MS Office時的情況一樣。

再看看資本方面。根據業界權威Gartner發佈的統計，被大數據技術所驅動的IT支出，也呈現出成倍增長的勢頭，到2016年，全球將達到550億美元，比2011年翻一番。

到了這個時候，再懷疑新技術革命是不是新一輪忽悠已沒有意義，無論是資本驅動，還是技術驅動，總之，現實正緊追忽悠，忽悠正變成現實，兩者合一了。

Google公司每天要處理超過24PB(2的50次方字節)數據，Facebook每天收錄30億次點擊和上傳，Twitter上每天有超過4億條微博發佈。這些領跑大數據時代的公司，當然不是在自娛自樂，它們都極爲認真地看待它們每日每時收集到的海量數據，把數據當作其核心資產。雖然巨頭們還不急於推出太過驚世駭俗的應用，但人們明白，由於信息構成了世界的本質，一旦大數據開始不受約束地顯示其力量，世界的各個領域都將被顛覆。

在目前這個階段，大數據對個人的顛覆已輕鬆完成。曾幾何時還被視爲個人隱私堅固盾牌的三大措施——告知與許可、模糊化、匿名化，在大數據時代都已名存實亡。隨着數據量越來越大，數據來源越來越多，個人毫無抵抗地變成了透明體。若一個小小的智能電錶都有能力憑它所收集的用電數據推測你的生活方式和起居規律，那又何況你的手機、電腦和銀行卡？又

編者按：我在2011年9月在中國重慶參加世界華文媒體論壇大會時，認識了一位《新西蘭聯合報》社長兼總編文揚先生。他經常向本報提供他的好文章希望與伊利華報讀者分享。文揚1957年出生於北京市，系統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以往經歷包括：中國海軍軍官，諮詢公司總經理(北京)，投資公司執行董事(新加坡、香港)，華文報社主編(新西蘭)和自由寫作者，出版物包括四本文揚文集和一本專著《中國力》。浦瑛



作者：文揚

# 大數據和未來國際政治

## (《互聯網的顛覆浪潮終將沖向政治領域》之二)

何況街上無處不在的攝像頭？一家英國報紙曾說過，如果《一九八四》的作者喬治·奧威爾活到現在，他會發現在他的倫敦公寓60米範圍內，起碼有30多架攝像頭在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世界早已進入了“超級老大哥”時代，個人的自由意志在喪失，個人的生存價值在消散。

大數據對團體的顛覆也輕而易舉。一個廣爲人知的案例是：爲了揭示日本相撲賽事中非法操縱比賽的情況，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家們使用了11年中超過64000場比賽的記錄數據，果真發現了消極比賽的發生規律，讓業內的潛規則大白于天下。

這還屬於很初級的應用。在目前的PB級時代，大數據技術剛剛成熟，還只是小試牛刀，從巨量的歷史數據中隨意抽取一部分相關關係，建立幾個簡單的算法模型，預測一下流感的傳播、機票的打折、電影的票房、交通的狀況……顯得很無害，很友善，很爲人民服務。但每年數百億美元所養育的大數據技術當然不只是爲了小小的“練習題”，十年之內，大數據的規模就將從PB級跨入EB級(2的60次方字節)，再跨入ZB級(2的70次方字節)。坐擁歷史上空前規模的數據量和空前發達的數據處理技術，“超級老大哥”們還會滿足於小規模、小範圍的顛覆嗎？

如果能夠輕而易舉破解日本相撲業內部不爲人知的“行規”，那麼，從理論上講，任何一個團體和組織的內部“行規”、隱秘知識、核心機密，都有可能通過海量的公開數據進行破解。而且，面對呼嘯而來的大數據海浪，組織的規模和內部的信息封鎖都不再構成障礙，安保能力的增長只是算術級的，數據能力的增長卻是指數級的，在這場競賽中，開始可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後來就會道高兩尺魔高八丈，可以肯定，大數據

全勝！問題來了。主權國家這個人類社會的利維坦，不過就是個較大規模的組織。十年之內，今天看起來還巍然屹立堅不可摧的國家，也終將面臨大數據浪潮的滌蕩。就像破解日本相撲賽事，很快就會有人宣佈，他利用大數據技術精準地破解了某個國家的特殊行爲模式。

希臘的債務危機是如何形成的？日本的右傾化會走多遠？伊朗核計劃的真實狀況如何？“薄荷四國”的提法是噱頭還是現實？……這類題目的話語權將很快從政治分析師轉到數據分析師手中，前者憑藉經驗和邏輯所建立起來分析框架，將被後者的海量數據沖得稀里嘩啦。

在新加坡國立大學馬凱碩教授近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作者開篇即提出問題：“中國強硬的新姿態背後傳出怎樣的信號？是一個強有力的政府在宣告中國從今將表現得像一個真正的大國？還是一個弱勢政府屈服於國內民族主義風潮？真相如何，外界不得而知，但我們能夠推斷，如果中國繼續堅持強硬立場，其在亞太地區獲取多少利益，便要在全球層面付出多少代價。這是中國未來不得不面對的新困境。”

在大數據時代，人

們很快就這樣說話了。針對一國政府與國內民族主義風潮的互動關係，甚至會有現成的模型，隨時通過大數據進行檢驗。至於一國在地區層面與全球層面的利益交換，也可以輕易數據化，得出基於量化指標的結論。

十年之內，各國政府都會設有應對大數據國際政治的專門機構。中國政府會發佈大數據報告，揭示日本的軍國主義歷史演變軌迹；日本也會針鋒相對，發佈關於中國軍力增長的大數據分析，甚至預測出中國建立海外軍事基地的時間。隨着各國政府從大數據分析中獲得的新知識、新觀察、新洞見越來越多，國際政治的整體局面必將大爲改觀。

但國家本身卻不是這場數據革命的主導者，而是被動的接受者和追隨者。“除了上帝，其他人必須用數據說話”，據說這是硅谷經理人的信仰，那些每日每時都在收集着“富可敵國”的數據資源的巨頭企業，其實也早已擁有了“強可敵國”的大數據力量，在所有人都必須用數據說話的時代，它們就是新的上帝。是它們在引領變革，在將硅谷的信仰的行爲規範推向全世界。如此看來，Google, Facebook, Twitter等公司在目前這個階段的相對低調和隱忍，更顯得其狀不祥，大有風暴前短暫平靜的模樣。

而一個基本事實是，最大的大數據公司都在美國，用國家來衡量，美國早已是囊括了大數據資源最多的國家。如果大數據終將導致權力的重新分配，美國將再次佔據優勢。這是大數據時代國際政治格局的另一個維度，也不得不正視。

文揚 2014年2月12日



# 爲什麼“亞布力炮聲”聽起來像矯情？

不出所料，從今年的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上，再次傳出陣陣“炮聲”，而且聽起來更加響亮了。

“炮聲”的方向，不在經營之道、行業分析、觀念創新這方面，代表中國新一代企業家的“亞布力人”，目前還極少有人真能在世界經濟舞臺上一語驚天下，一言改江山。正如人們看到的，中國式“亞布力大炮”的目標所向，一如既往，主要還是在本國政府行爲和社會制度這方面，這是他們最爲熱衷、樂此不疲的。

所謂“企業家談政治”，此議的確不是小事。改開35年後的中國企業家群體，規模已經相當龐大，登上全球福布斯排行榜單者已不少，合計財富夠買下幾個中等國家了。平心而論，這樣一個坐擁巨大財富和聲望的精英群體，的確不可能長期保持低姿態低調調門，不可能長時期不過問政治。假設這個群體不是在中國，而是在某個非洲國家或拉美國家，其他不說，就憑着比國家財政收入還高出幾倍的私人財富，還有談不談政治的問題嗎？這些人本身就是政治了！更換政府、挑選總理、修改法律，在自己的亞布力論壇上就定了。

看得出來，一部分“亞布力人”就很急于進入這個境界，一種自由資本主義的理想境界。歸納一下，就是“四個高於”，即：資本高於權力、經濟高於政治、社會高於國家、私權高於公權。

說到底，他們難以遏制的談政治心結、罵政府沖動，無不是受這“四個高於”的誘惑：當了資本家卻仍被權力壓着，經濟上成功了卻沒有政治地位，成了社會精英卻必須臣服於國家，坐擁巨大的私權力卻不敢挑戰公權力……很高興，很憋屈！只要一天不實現這“四個高於”，他們就一天不舒坦、不解放，就總有個尚未成功的革命事業在前方召喚。

在今年的年會上，那位著名的“大炮”忍無可忍，幾乎就要脫口而出了，“我們最大的問題是如果政府說了不做我們沒有任何辦法，因爲我們對政府沒有任何約束，…如果我們有辦法能把權力關到籠子里，三中全會所有文件才有可能被落實，或實現我們中國的進一步改

革。”他說。

很明顯，這裏的“我們”，已經在意念上完成了超越，已經開始代表他們心目中高於權力的資本、高於政治的經濟、高於國家的社會和高於公權的私權，幾位先鋒人物現在急于將意念化爲行動，急于由我們“亞布力人”(自由派經濟學家-企業家集團?)出面約束政府，把權力關到籠子里，然後自己來主導一切，安排一切。他們的願望能夠實現嗎？

“四個高於”在中國決無可能

歷史見證，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多年，新一代企業家群體應運而生。這裏的基本事實是：無論這個群體現在長成了什麼樣子，即使已成人猿泰山綠巨人，從歷史演變上看，也不是自身前世今生的再延續，而是中國國家政策的新產物，其誕生的起點，甚至可以精確地追溯到鄧小平“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一句話。

不是嗎？今天的“亞布力人”，沒有一個能把自己的發家史追溯到鄧公這句話之前。

這就是中國企業家與生俱來的一個身份困境。在這個新群體誕生之前，作爲現代國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三十歲了，新生企業家群體並沒有參與國家的創造，恰恰相反，是國家通過政策創造了新生企業家群體。兩者的關係，就像父子關係一樣，新生企業家群體永遠是兒子，國家永遠是父親，無法改變。

橫向比較地看，這個關係的確有些特殊。在西方國家，由於企業家的歷史遠比現代國家要長，而且整個資本主義社會從封建社會漸變轉型而來，在轉型過程中，資本權力和其他形式的私權力都得以相對完整地保持，沒有中斷，所以，企業家群體全過程參與了現代國家的創造，私權力全過程參與了公權力的創造。就這樣造就了一個與中國正好相反的情況：企業家精英是國家之父，國家是企業家群體之子。讀一下美國西歐和日本的近現代史，莫不如此，沒有例外。

俄羅斯的情況有所不同。在前蘇聯時代，國家公權

力一統天下，舊時代企業家集體消亡，私權力歷史中斷，直到蘇聯解體後的葉利欽時代，新一代企業家又重新誕生。但與中國不同的是，企業家群體不是在國家政策的調整實施中有計劃地養育出來，而是在國家解體後的廢墟上野蠻地生長出來，新一代企業家群體與國家之間，並沒有父子關係，誰也沒有創造誰。到了普京時代，國家權力重新恢復加強，國家與企業家群體之間更像是同胞兄弟，時而相互提攜，時而衝突對抗。

如此看來，從國家與企業家之間的關係上分，無非三類：西方是第一類，前者是後者之子；中國是第二類，後者是前者之子；俄羅斯是第三類，兩者是兄弟；其他國家或接近西方，或接近中國，或接近俄羅斯，也都不出這三類。

在企業家是老大的第一類國家里，上述的“四個高於”是自然而然順理成章之事，毫不稀奇。但在國家是老大的第二類國家里，因爲權力不會讓位于資本，政治不會讓位于經濟，國家始終高高在上，公權也始終高高在上，所以，可以有金融街但不能有華爾街，可以有亞布力但不能有共濟會，可以讓市場起決定性作用但國家仍然統領一切，可以讓企業家談政治，但政治仍然自行其是，獨斷乾綱。

這樣的國家體制當然不是沒有問題，更不是不容變革，但變革的方式一定不是西方式或俄羅斯式的，也不是“亞布力人”可以主導的。國家至上、政治至上的中華傳統，從兩千年前的秦漢帝國一直貫穿到今天，早已內在于文明本身。任何一個社會集團，都必須正視並敬重這個傳統，尤其要認識到它的獨特性以及對於整個民族生存發展的重要性，所有出於個人私利或小集團利益而發起的挑戰，都是妄自菲薄。

先富者的不滿就是矯情

“先富”政策三十年，新一代中國企業家呼嘯而起，以歷史上空前的速度積聚起了巨大的財富，成爲新貴

族。“亞布力人”這個名稱的涵義無論有多少，首先一條，也是最擺脫不掉的一條，就是“中國先富政策最大受益人”或“中國改開政策最大得利者”。

近年來，很多人已成爲可以和世界級財富家族平起平坐的超級富豪，但一個突出的事實是：在福布斯財富排行榜上，來自中國的富豪無一例外都在“白手起家”之列。全世界人都明白，這並不說明中國企業家的特殊性，並不意味着他們個個都是白手起家的高手、平地起樓的奇才，意味着把他們放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里他們也都能有同樣的壯舉。這一特殊現象，其實正是這一代中國企業家所在國家和所處歷史階段特殊性的反映。

但他們當中很多人並不這樣想，甚至越來越不這麼想，所以每年都炮聲隆隆，越來越隆隆。聽口氣，似乎他們在中國生於斯長於斯的歷史身份和血脈聯繫反倒成了束縛他們的桎梏；似乎他們不是最大受益人和最大得利者，反倒是最受壓抑、最不得志的一群；似乎中國本來是他們的，財富本來也是他們的，反倒是國家反客爲主，後來先得了。

亞布力論壇十四年，從來沒見到有人劃出這條底線：既然沒有參與國家的創造，也就無權決定國家的性質，既然身爲國家政策的產物，也就必須尊重國家的威權。

如果不能守住這一條線，一心想效仿西方國家和俄羅斯的同行，掙脫國家約束，甚至反客爲主，迫使國家就範，那就是犯了不明事理、忘了自己是誰的錯誤，就成了唧唧歪歪的矯情孩子。

“亞布力人”的出路不是沒有，但肯定不在短時期內。只有中國企業家群體真正成熟了，英雄輩出了，對國家對民族有所擔當了，在世界舞臺上也一言九鼎舉足輕重了，那時候再重新調整與國家之間的關係，重新爭取私權力的地位，才有希望。

參照西方歷史，這個成長期至少在百年以上。寄望於中國“亞布力人”有此心胸和眼光，早日告別兒童期煩惱，儘早成熟起來。

文揚 2014年2月16日

